2018.12.10 서천

孙兴杰：G20、中美“休战”与紧缩的国际体系

发表时间：2018-12-04 15:31 来源：国际网

<http://comment.cfisnet.com/2018/1204/1314545.html>

在G20峰会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逻辑凸显出来。脱钩，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仅国家之间的关系脱钩，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也在脱钩，世界朝着“零国集团”的方向滑落。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提供了90天的谈判和磋商的时间，至于未来前景如何，还要看双方经济官员能否在这一揽子议题达成共识或者妥协。在G20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日渐消失的昨日世界，但明日世界如何，还不得而知。

今年的G20阿根廷峰会可能是最不具有多边性的一次聚会了；几乎没有人再关注G20峰会之后达成的联合公报，因为焦点都集中在了中美元首一次长长的晚餐会上。而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贸易战“休战”也让这次G20峰会不会显得没有什么成果。

多边搭台，双边唱戏，是这次峰会最大的看点，见或不见，都是新闻。G20峰会的本来功能是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然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合作是非常困难的，WTO的改革甚至生存，在这个日渐紧缩的国际体系之下，都成了一个问题。

**一．**G20阿根廷峰会的地缘政治色彩应该是最浓烈的一次了。卡舒吉被杀的余波犹存，沙特王储萨勒曼还是以极大的勇气出席了峰会，从画面上能够看到萨勒曼的形单影只。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都向萨勒曼表达了强烈的关切，尤其是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表演，至少表达了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卡舒吉之死不仅让沙特这样一个全球最重要的产油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对美国-沙特的双边同盟关系造成了极大冲击。特朗普已经选边站在萨勒曼一边，但是中情局等美国情报部门以及国会还是认为萨勒曼王储与卡舒吉之死有着直接关系。卡舒吉之死已经成为沙特短期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加上也门连绵不止的战争和饥荒，沙特尤其是萨勒曼王储的国际形象已经非常负面。

除此之外，在G20之前，俄乌在刻赤海峡的激烈对抗，让普京总统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原计划与普京的会晤，在晚餐间隙，两位领导人还是聊了几句，当然主要是关于俄乌问题。让特朗普比较糟心的是，关于2016年大选的调查可能会有新的变化，对特朗普不利。对流产的美俄首脑会晤，普京似乎并不很在意，他说，特朗普是个成年人了，而且他很有经验。默克尔在早餐时与普京有接触，希望俄乌对峙不要升级。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呼吁各国领导人能够借此机会讨论叙利亚、也门等地缘政治的问题。

普京和萨勒曼见面的镜头基本折射出了当下世界政治的“戏码”：二人见面时略带夸张的笑容和击掌握手，也许是为了发泄不满，也许是一种政治表演，显示两国的团结，当然也是同病相怜。当然，面对这样的形势，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有人也认为西方已经是没有牙齿的老虎了。

可以说，地缘政治压倒了地缘经济；在G20成员国之间发生的地缘政治龃龉，根本不可能在多边场合得到讨论，更不要说是解决了。在G20走过了十年之际，一个日渐尖锐的问题出现了：没有地缘政治合作，多边经济合作是可能的吗？当G20成员国之间因为卡舒吉之死、俄乌冲突而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时候，G20还能奢望就全球宏观经济达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吗？

**二．**在G20峰会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逻辑凸显出来。脱钩，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仅国家之间的关系脱钩，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也在脱钩，世界朝着“零国集团”的方向滑落。

第一，大国协调与合作的意愿在下降，摩擦甚至冲突变得越来越平常。当代世界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秩序的全球化和世界化，大国治理是秩序的基石，大国之间需要协调，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责任，同时大国也对小国有义务。G20无疑就是大国政治的产物，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的一个超级俱乐部。在经济危机期间，G20为各国之间的沟通理解提供了渠道，也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局提供了助力。现在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大萧条的水晶球不在了，大国合作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第二，不平衡发展改变了治理格局，随之而来的是责任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还没有得到确证，但是中国实力的抬升是不争的事实。特朗普“退出主义”的核心原因就是不愿意再承担全球治理的成本，关注的是美国的相对收益；在G20之前，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认定，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他对“发展中国家”也失去了耐心，要的是对等贸易。不是美国遇到了挑战，而是美国已经厌倦了现有的体系；可以说，美国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国家”。

第三，源于1970年代，并在冷战后不断强化的全球化浪潮出现了分岔，甚至是逆转。过去40年，全球化如同潮水一样涌动，全球商品、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交流掩盖了诸多的矛盾。40年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开始释放，对本土利益的强调压倒了全球化话语，仅仅两年时间，全球政治话语已经出现了180度的转折。

第四，支撑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结构正在裂解，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来临。“冷战”后美国一枝独秀，也可以说是单极世界。2001年后，全球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安全话语和安全态势。美国从2009年开始进行战略调整，结束了伊拉克战争，2014年从阿富汗进行撤退，即便在叙利亚危机、ISIS兴盛的时候，美国都保持了高度的克制。特朗普上台之后，试图塑造一个“有性价比”的安全结构，无论双边军事同盟，还是北约，都需要盟友承担更多费用。大国回归传统、强势领袖频出，外交与安全已无定法，因时因势而变，规则让步于策略。

**三．**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之一。在G20峰会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两国元首抓住今年最后一次重要机会实现了会晤，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率的磋商，为中美贸易战按下了暂停键。

中美双方达成的基本共识包括：芬太尼被列入受控制的物质，向美国输出这种物质，会受到法律制裁；高通-恩智浦的交易若再次递交，中国会允许。可以说，这两项都是具体的成果，也是在短期内可以执行的。

另外，美国不提高关税水平，而中国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等，以此减少贸易顺差，努力实现中美贸易平衡。今年5月中美高级别磋商时，基本达成了类似的共识。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未来90天内，中美将就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服务业等多项议题进行谈判。

可以说，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提供了90天的谈判和磋商的时间，至于未来前景如何，还要看双方经济官员能否在这一揽子议题达成共识或者妥协。

在G20峰会之前，美方透露出的信息是比较强硬的。但最后的结果表明，特朗普是最终的拍板者，白宫的“鸽派”（库德洛、姆努钦）和“鹰派”（莱特希泽、纳瓦罗）都参与了午餐会，应该说最后的结果也是两派之间妥协的结果。但对于拥有“水银”一般好动心灵的特朗普来说，共识是暂时的，他要的结果却一直没有变化。给“鸽派”的是一个谈判的机会，给“鹰派”的是谈判有时限。

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因为这次休战而有了根本转变，现在来看似乎并没有，比如彭斯的一系列讲话，尤其是10月的对华政策演讲，代表了白宫的基本态度。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中美之间的“马拉松”不会停歇。G20峰会前夕，美国舰队在今年内第三次穿越台湾海峡；白宫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半年内中国的改变微乎其微。而纳瓦罗、莱特希泽的“在场”也说明贸易战的团队依然如故。

中美是不是要陷入“冷战”的泥潭之中呢？首先要清楚：“冷战”的要素有哪些？核武器加阵营化的对垒。现在来看，中美关系中有一些构成“冷战”的要素，比如两国都是核国家，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上存在着分歧。但中美并不是两个平行市场，而是嵌套在一起；在经济上，中美关系就是孙悟空与铁扇公主的关系，真正的危险时刻是孙悟空从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跳出来时。另外，中美之间还没有形成阵营的对垒，而是灵活的外交。当然，美日印三方领导人会晤也越来越呈现出印太战略具有的“阵营属性”。

在G20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日渐消失的昨日世界，但明日世界如何，还不得而知。

廉德瑰：推进中日关系还需清除哪些障碍

发表时间：2018-12-04 15:29 来源：国际网

<http://comment.cfisnet.com/2018/1204/1314544.html>

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突破日美同盟发展中日关系在现阶段并不现实，但破坏中日关系以取悦美国也不符合日本利益。日方如果真的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能由竞争转为协调，由相互威胁变为伙伴，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就应淡化日美同盟的反华色彩，追求和平与合作的目标，管控三个争论焦点，坚持四个文件精神，排除障碍和干扰，共同推动中日关系走向广泛合作的新时代。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为契机，两国关系风雨过后，渐露彩虹。日方希望两国关系从此化竞争为协调，互利合作，互不构成威胁。中方则强调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然而，两国要真正实现和解，还需正视现实，克服难点。

首先，要正视一个战略前提，即日美同盟。日美同盟是一个实际存在，它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对日占领的背景下形成的，美军基地遍布日本各地，日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美国掌控之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两国提出世代友好的愿景，同时鉴于现实考量并未触及日美同盟。对日本来说，这个同盟既是制约其所谓“普通国家”化的紧箍咒，也是其防卫政策的重要一环，日本的任何对外战略调整，都必须考虑美国的舒适度，中日关系也不例外。比如，近年来尽管日本拒绝参加美军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但又不得不去那里活动，这既是向中国施压，也是给美国一个交代。安倍访华回国后，NHK电视台播放了“加贺”号在南海被我“兰州”舰跟踪的视频，很是耐人寻味。联想到10月27日安倍访华的最后一天，特朗普扬言要对日本商品征收20%关税和29日安倍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强调日美印澳战略合作，也足以让人感到日本外交“捉襟见肘”的矛盾性。

其次，要重视两个基本目标，即和平与合作。在不触及日美同盟的前提下，中日两国也不是不能改善关系。邦交正常化时两国达成了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共识，还把两国间关系定位为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关于互利合作，田中角荣曾说过：“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最值得高度评价的是中国方面放弃了一切对日赔偿要求。……日本应该对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日方从1979年起总共向中方提供了约32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中国也向日本开放了广阔的市场，如今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如今，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尽管在日美同盟前提下，但中日务实合作，还是前景可观。

第三，要管控三个争论焦点，即历史、台湾和领土问题。三个焦点是在追求和平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关于历史问题，日方曾在1998年表示过：“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但前首相小泉曾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安倍首相也向靖国神社献“真榊”，造成中国人民无法相信日方在历史问题上有反省的诚意。关于台湾问题，日方曾郑重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但日本的亲台派至今与台湾当局藕断丝连，试图打台湾牌，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关于钓鱼列岛问题，日方无视史料，硬说这些岛屿是无主地，还破坏搁置争议的共识，强行将该岛屿国有化，导致两国关系降入冰点。中日关系要想长期稳定，就必须克服这三个难点，求同存异，尊重感情，以心传心，有效管控分歧。

第四，要坚持四个文件精神，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这四个文件是中日两国在日美同盟前提下达成的解决争论焦点问题的政治协议，通过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就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达成了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并在1978年以条约的形式把这些共识固定下来。1998年又与时俱进强调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强化了和平与合作的目标，日本承诺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2008年，两国提出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愿景，给中日关系以新的定位，日方还承诺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并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坚持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就是遵守承诺，回归友好合作的原点，就是不忘初心，共创未来的保证。

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突破日美同盟发展中日关系在现阶段并不现实，但破坏中日关系以取悦美国也不符合日本利益。其实，中日关系并不针对第三国，中国既不试图拉日本反对谁，也不希望任何同盟成为反华的工具。日方如果真的期待两国关系能由竞争转为协调，由相互威胁变为伙伴，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就应淡化日美同盟的反华色彩，追求和平与合作的目标，管控三个争论焦点，坚持四个文件精神，排除障碍和干扰，共同推动中日关系走向广泛合作的新时代。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章转自环球网)